

文学让我们相聚——在鲁院第三十四届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发言

梦幻之地 包安宇

我是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老师。我出生于山东的泰山脚下,那里人口稠密,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关于人与人关系及其彼此困境的创作灵感。

很多个深夜,当所有人都睡了,就连天空和大地的呼吸也变得很轻,仿佛这个世界从来不曾存在。我结束每晚的写作,站在窗前,看向漆黑夜色中沉睡的万物,常常忍不住问自己,我为什么要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、不倦不休地写作,将工作之外的时间,几乎全部给予了孤独?

我想,这样一个问题,或许每一位写作者都曾经在深夜中问过自己。世界充满了喧嚣与诱惑,而写作,并不能带来多少世俗的利益,那么,我们为什么还要永不停歇地写下去?或许,在不同的人那里,会有不同的答案。但对于所有热爱并一生坚持写作的人,最为终极的答案,一定是我们需要写作,就像我们不能没有灵魂。

此刻,恰是生命给予的这份馈赠,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,相聚在这里,并将开启4个月的美好旅程。而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我问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,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前往鲁院,从一名大学老师,重新回到已经陌生的学生身份?无疑,鲁院是作家的摇篮,是文学的圣殿,多少作家在关于鲁院生活的记录中,都用无比深情的笔触这样描述此处的学习历程。而我,却更愿意将鲁院视为创作最为理想的梦幻之地。

而这样一段因暂时脱离了工作和世俗生活,变得无比纯粹的梦幻般的人生经历,必将长久地影响我此后的创作。我呵护这样一个闪烁着纯净光泽的梦境,犹如呵护写作在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位置。而此刻,正是万物复苏的春天,梦,才刚刚开始,这多么美好。

文学是生命打开的方式 包倬

春天已经来临,草长莺飞,世界蓬勃,我们以文学之名相逢。很荣幸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,能感受北京的春夏,共同沐浴文学的圣洁之光。这是万物生长的季节,它充满了寓意,没有比这更好的相逢时机。天下因有文章而光明,愿文学和友谊,永远照亮我们的内心。

与君初相识,犹如故人的归。因为文学,我们一见如故。于是,我想谈几个跟“故”相关的词。第一个词是:故事。

2012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,主题就是“讲故事的人”。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,世界是由故事构成的。故事是构成世界的沙石,小说是通天塔。马尔克斯认为,“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,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。”即使如《百年孤独》那样的作品,仍然是“没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”。

第二个词是:故乡。我的故乡在四川凉山,这是一个以音乐和贫穷著名的地方。我们习惯在“凉山”前面加上“大”字,其实是为了彰显故乡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那是一片像拉丁美洲一样的土地,神秘、荒蛮,那里生活着毕摩、歌手、诗人……而我只是那片土地上的一朵蒲公英。今年,我已离开凉山20年。“作家这种职业,他的技巧、他的构思才能,甚至他细腻隐蔽的叙述手法,应该是在青年时代就融会贯通。我们作家就跟鹦鹉一样,上了岁数,就学不会说话了。”这同样是马尔克斯的观点,如果真如他所说,那我们写下的文字,其实就是故乡的底色。故乡就是世界,故人就是世人。

第三个词是:故去。我曾经读过刘震云的一篇文章,《文学解决了生死问题》。他认为文学有一个作用,这个作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学科、任何民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,这个问题是生死的问题。人都会死,这可能是最大的悲剧。但是文学人物却不会死,贾宝玉、林黛玉,他们不但没死,而且也没老。所以,等待着作家的,正是写下那些不死的灵魂。

文章千古事。这些年,我渐渐明白,写作是一种宿命。我将读书、写作和思考,等同于生命本身。我写下疼痛、欲望,以及人世的艰辛,只为发出一只蚂蚁的呐喊;我写下梦想、希望、坚韧和善良,只为彰显人世之光。如果将文学从我的生命中抽离,那就是将骨头从我身体里剔除。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在《惶然录》的开篇写道,“一旦写下这句话,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。”如果真有永恒的谶言,那么,我要写下的一句话是:一个被文学之神眷顾的人,应该将毕生的心血献给文学,就像亚伯拉罕向上帝献出以撒。

草木向荣 文学常青 胡竹峰

今年我34岁,上第三十四届作家高研班,这个巧合很有意思。34岁的男人,说老不老,说年轻不够年轻,再当一次学员,更有意思。社会是关注文学并支持作家的。

能来到鲁院学习,这是对我过去写作的认可,也是对今后的期待。写了十几年文章,写了十几本书,得了点名得了点利,这名利像做梦一样不真实,恍恍惚惚。来鲁院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清醒,知道缺什么,软肋在哪里。

作家从来不是培养的,但作家需要文学的氛围、文学的心境。鲁迅文学院有光荣的过去,当代文学界许多大人物都曾在此进出。此刻站在这里,一是为了鲁迅,一是为了文学。鲁迅是现代文学的高峰,他的作品成为白话文范本之一,是中国文学优秀的传统。人的能力有限,精力有限,一生干不了几件事,我也放弃了很多爱好,只是安心写作,觉得选择了一件有可能做好的事。我这代人开始不再年轻了,光阴无情。胡适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:偶有几茎白发,心情微近中年。做了过河卒子,只能拼命向前。

很多人都说文学很难,但也容易,因为快乐,所以享受。还有人说文学不创新就无路,没出路就没出路。写作不是为出路,是为喜欢。写作是我自找的我。我尊重创新也看重创新,但我更在乎继承与生长。我目前是从散文创作的,我觉得散文更应该继承,然后让文本慢慢生长。

余英时先生曾告诉我,一定要读同代人的文章,因为为行情,一个人做学问写文章,要知道行情。我的好朋友包倬,作为一个优秀的同行,他写作恳切钻研,给了我很好的榜样。很多前辈作家出门会带几本书,带上电脑,在旅途中也不放弃阅读与写作,他们为我做了很好的示范。

正月里去池州山里看雉戏,遇见两句话,一句挂在礼堂上方:噉嚼神圣。一句写在村里祠堂的后门,人敬神自灵。这两句话也让我再一次体悟出文学神圣,文心要诚。

我不善交际,但愿意和诸位校友多交流多沟通。山有包容鸟自知,感谢鲁迅文学院这座大山让我在此读书学习,开始另一段文章生活,4个月的课程是一次修整。文学正需要十年树木的精神,愿我们欣欣向荣,愿师生性情常青,愿同学情常青。我们从未停止前进到更广阔文学世界的步伐,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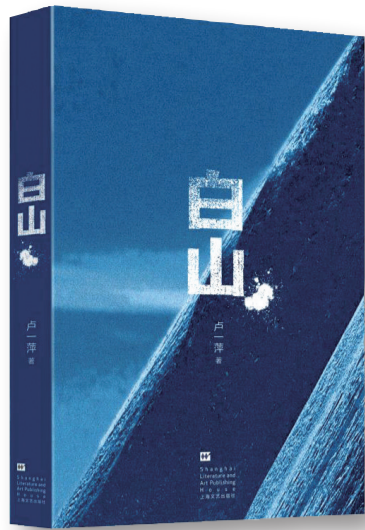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与守望 秦晓

我是一名空军军官,犹记得15年前的一个冬日,我作为干事陪同政委辗转6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佛爷顶雷达站,探视慰问春节依旧坚守在那里的4名战士。赴政委在雷达站内嘘寒问暖之际,我溜了出来,远远地看见一名战士在不远处站岗,走近一看是一名皮肤黝黑、嘴唇干裂的老兵,于是我和他闲聊起来。我问他:“班长,你当多少年兵了?”他对我说:“12年了,在佛爷顶待了12年。”我惊讶地问他,在这样一个山势高、雾气大、温度低的地方一坚持就是12年是怎么做到的?“责任。”就这两个字,从他嘴里貌似轻盈地蹦了出来。当时我被这两个字所震撼,甚至刻意从他的眼神中去寻找哪怕一丝的不真诚,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,接着说:“咱是当兵的,站岗放哨、保家卫国是职责,虽然条件艰苦点,生活孤特点,但想想咱这雷达站是为了保障空军的飞行,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嘛。”他转过头冲我露出了憨厚的笑容,旋即又转了过去,紧握钢枪凝视着远方,我拿起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刻,准备作为新闻报道的素材,刚打算离开的时候,老兵又开口了,“秦干事,题目就叫做守望吧。”是的,从此“责任”与“守望”这两个从老兵嘴里说出来的词,始终推动和鞭策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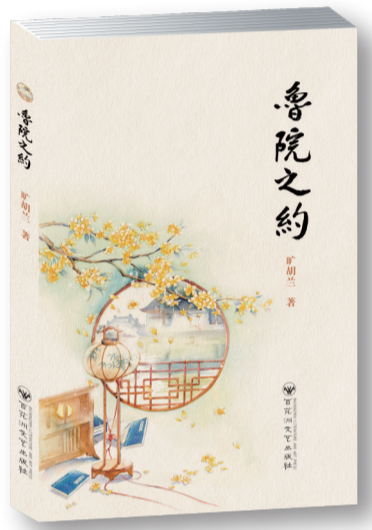
经历了战火与硝烟的洗礼,共和国最大的心理需求是抚平战争创伤的同时,对自己的革命经历与战斗历史进行文学叙述,作为军旅作家应该以报国之民的责任意识,本着对国家负责、对社会负责、对军队负责、对战争负责的态度,守望在军旅文学的精神高地,多为民族、为国家、为人民创作出反映民族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。

军队改革如火如荼,强军之路再启新征程,作为军旅文艺工作者的一分子,我感到肩头责任更重,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,军旅作家的文学创作既要靠艺术才华,更要靠政治自觉,因此我期待在鲁院学习的4个月里,淘洗思想强塑灵魂,让鲁院即将给予我们的浸润、渗透和滋养,化作今后创作的智慧和力量,为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,讴歌我们的人民军队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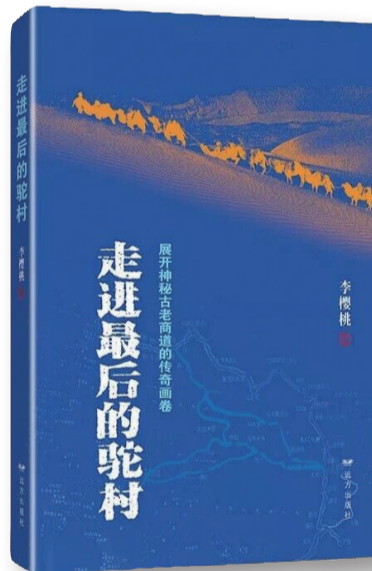
桃李天下



卢一萍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,其长篇小说《白山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作品由上部《尘土》、中部《风》、下部《光明》构成。故事讲述了普通士兵凌五斗长期生活在“生命禁区”天堂湾边防连,因为一次意外,血红蛋白发生变异,皮肤变蓝,成了蓝人,被传为“外星战士”,最后成为英雄。小说呈现了微小人类与强大自然的传奇,这些传奇经历凄而不虐,寓庄于谐,深刻表现了人在极端生存环境中表现出的牺牲之美、坚守之美、战斗之美。



旷胡兰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其散文集《鲁院之约》近期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精选了旷胡兰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之后创作的40余篇散文。文章兼具理性观照和情感关怀,勾勒出一个自由古朴、静穆和谐的世界,呈现了生活中的普通人群既艰苦又美好的生活状态。



李樱桃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,其长篇纪实文学《走进最后的驼村》近期由远方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在作者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,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驼村的起源、发展、影响及历史作用。全书共5部分,包括由驼村出发的世界之旅、驼道连接起的广阔世界、驼商闯入国际商贸舞台、向死而生的神秘通道、草原上崛起的骆驼商城等内容。

书海一瓢

《火车与匕首》:乡土的隐痛与梦幻

郑润良

如果就题材而论,“70后”作家张爽的最新小说集《火车与匕首》中的大部分篇目都可以归入乡土写作的范畴。和许多书写乡村的作家一样,张爽选择了自己的故乡“四顷地”作为叙述的“原乡”,在这里铺陈人物的爱恨情仇。张爽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并不执意表现近年来乡土写作的热门主题,比如乡土的空心化、乡土社会原有淳朴的人情伦理受到外部商业社会的侵蚀等。张爽更喜欢表现乡土内在的善与恶。这种内在的善与恶通过张爽的生动书写获得了某种普泛性与寓

言性。由于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与深远影响,中国历来被称为乡土中国,而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一脉也格外强大。书写乡村问题因此绝不仅仅停留在乡村,而是具有民族、时代的整体性辐射的意义。张爽以故乡四顷地为个案,结合切身身体验深入挖掘,他的“四顷地”书写也因此日益深刻,卓有成效。

中篇小说《火车与匕首》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展示乡土之“恶”。小巴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听话的好孩子,从小刻苦努力、品学兼优。遗憾的是,他没有如愿考入市重点中学,只上了一所职高。小说主要表现小巴在职高与兰志勇之间的纠葛。兰志勇是一个痞子学生,在学校里横行霸道。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忍受了兰志勇的言行,但貌似弱小的小巴无法抑制内心的义愤,挑战兰志勇。小说中的这所职高事实上成为乡村世界的隐喻,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暴力哲学。兰志勇是个痞子,但同时也是学校秩序维持会的队长,也是这所学校管理体制所倚重的对象。也就是说,“老师”们也通过暴力哲学来管理学生。小巴在作文中幻想自己拥有一把“匕首”来刺破灰色的现实,却被管理者误解为他确实拥有一把足以挑战他们的凶器,在教导主任的指示下,小巴又被兰志勇收拾了一顿。退学回家的小巴在同伴二条的鼓动下聚众到学校找兰志勇报仇,却意外地将前来劝架的同学小葛打倒在地。可以看到,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暴力哲学的服膺者,包括原本

怀抱理想主义冲动的小巴。乡村之“恶”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吞没了自己的孩子。张爽喜欢以少年视角观察乡村世界。在张爽笔下,暴力的承受者和实施者往往也都是少年。在《坐在树上看风景》中,少年东来的父亲王宝贵在妻子死后每日喝得烂醉,而后就开始肆意殴打自己的儿子和女儿。最终,王宝贵死在家门前的坑里。人们都以为他是自己醉到跌死的。其实,他是被他儿子东来推到坑里埋掉的。《火车与匕首》《坐在树上看风景》都演绎了乡村世界暴力的循环与暴力哲学的蔓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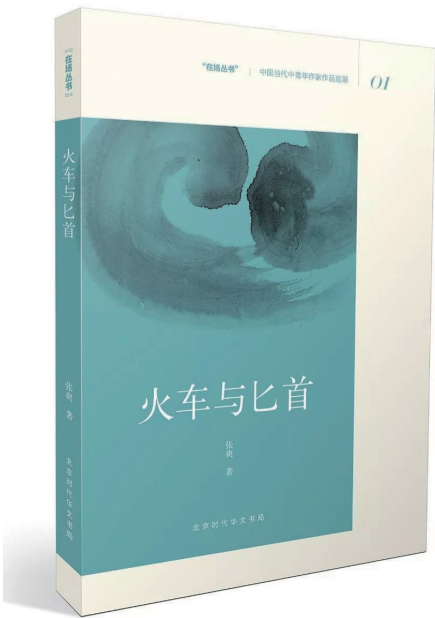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,张爽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物沉溺在阴暗的暴力世界中。在他看来,乡土世界同样有它内在的光与亮,有它的梦想。《饥饿的熊》中,乡村汉子熊宝德经常受到同村二嫂子的资助才得以不饿死,只能通过帮忙干些农活来回馈。二嫂子丈夫去世后,熊宝德却再也不肯上二嫂子家,怕别人嚼二嫂子的舌头。二嫂子改嫁后,熊宝德痛哭一场后离开了四顷地。作者笔下的二嫂子和熊宝德无疑是乡土社会美德的象征。

作为暴力的象征之一,匕首的意象在张爽的作品中颇为常见。而“火车”这一意象也在张爽的作品中频繁出现,代表了乡土上的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幻想。《信使》中的少年“我”最大的梦想是在15岁之前,一个人坐火车出门远行。火车代表了一个少年对远方的热望,还有对可能遭遇的“艳遇”的幻想。因此,《信使》中的美艳少女与其说实有其人,

不如说是少年幻想的产物,所以小说结尾,作者才留了这么一笔:“我不甘心,又在车站附近找了找,还是没有,她的身影像她她身上那种浑然一体端庄而神秘的气息一样,在我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……”

除了对乡土世界“四顷地”的深入书写,小说集《火车与匕首》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张爽近期在创作上的其他探求与突破,比如他的“西厢记”系列小说《狗男女》。小镇文人苟富贵通过送领导字画成为东风镇镇政府的编外人员,无聊中在网络上认识了几个不甘寂寞的女文青,发展出几段暧昧不清的情感。苟富贵的妻子崔莺莺为别人装修时不慎坠地重伤进了医院,苟富贵偶然得知曾经与自己网络世界打得火热的网友“贝多芬”其实是教育局局长的夫人。于是,苟富贵顾不得斯文扫地,一张“艳照”使他敲诈到了想要的医疗费,却也使他尝到了自己酿就的苦果。正所谓“人心不古”,在张爽的“西厢记”故事中,“张生”与崔莺莺们的故事已全无古典文本中的浪漫气息,“爱情”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。张爽这一系列作品的价值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的发掘。

从小说集《火车与匕首》,我们可以感受到张爽积淀多年的写作脉路。张爽的写作,从“四顷地”出发,紧贴着熟悉的人物写,稳扎稳打、日益开阔。这样的写作,自有其深刻之处,也更加耐人寻味。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)



鲁镇 白描